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1.06.021

《长恨歌》主题争论新思考^{*}

张中宇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批判理性主义也称“证伪主义”、知识进化论,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着错误,需要通过“证伪”发现并矫正其中的错误,推动知识进步;科学包含错误并非缺点,而是知识探索过程的必然现象,“可证伪性”正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志。《长恨歌》主题解读、阐释过程的分歧正是提出新说,“证伪”,再提出新说,再“证伪”,不断“试错”,最终更加逼近《长恨歌》主题真实面貌的研究过程,参与者的“试错”都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贡献。批判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批判(非意识形态或单纯学派之争)和这种批判精神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理念对推动中国学术的深度拓展与实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批判理性主义;《长恨歌》主题;批判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1)06-0118-06

一、批判理性主义的提出及其评价

(一)波普尔与批判理性主义(“证伪主义”)

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94),或译为“波珀”、“波普”,原籍奥地利,父母都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逃避纳粹迫害移居英国,入英国籍,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之一,研究范围甚广,涉及科学方法论、社会哲学、逻辑学等,在西方哲学界和政治学界影响甚大。波普尔1933年完成的《研究的逻辑》(1956年英译本作《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译,科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标志西方科学哲学重要学派——批判理性主义形成。由于波普尔在学术上的成就,1965年被英国皇室授予爵士称号。卡尔·波普尔还是英国皇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

《科学发现的逻辑》(《研究的逻辑》)是波普尔的重要科学哲学著作。波普尔认为,无论通过内省还是观察,都不可能直接看透事物的本质,不能直接获得真理。但可以“猜测”真理。而猜测可能是错误的,要想办法排除其中的错误。在进行研究的时候,研究者提出假说,然后通过实验检验这个假说,当它与实验不符的时候,研究者修改假说使它能解释实验并作出新的预测,再通过实验来检验它,如此周而复始,科学不断进步。为促进知识进化,更快逼近真理,波普尔要求大胆猜测,提出的假说最好能做出更多和更精确的预测,这就要求假说除了能解释已知的实验结果外还要能做出新的预测。同时为了更快排错,还要对科学理论进行最严格的检验。“大胆猜测,严格反

* [收稿日期]2011-07-17

[作者简介]张中宇(1964—),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驳”,是波普尔的基本思想。^①

波普尔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着错误,即使它能够暂时逃脱实验的检验,但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而遭到实验的反驳或“证伪”。科学理论通过外界的反馈不断地“纠错”从而获得进步。因此,波普尔主张采取批判的态度,科学理论通过不断证伪、否定、批判逐渐趋于完善,科学就是在不断提出猜想、发现错误而遭到否定、再提出新的猜想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批判理性主义突出强调理性的批判和这种批判精神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特征,其理论又被称为“证伪主义”。波普尔认为一切科学理论都是科学家的自由猜测和假设,是针对问题的试探性理论,是可错的,所以科学也包含错误,要经受严格的检验,这不是科学的缺点,而恰恰是它的优点,它的力量所在,或者说,“可证伪性”正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志。要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理论,重点并不在它能被证实,而在于它能被证伪。只有一个命题能证明“有错”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迷信或宗教。科学研究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试错”法。科学通过“证伪”推动提出新的修正的命题,通过新的否定再提出新的命题,从而推动学术进步,因此“证伪主义”也被称为知识进化论。

(二)对批判理性主义评价

“试错”法是没有休止的。基于波普尔的证伪原则,科学理论永不能被证实,我们只能将“不好”的理论除去,留下较好的假说,但永不能说某一理论为最后的事实或真理。科学理论只能被证伪而不能被证实,“试错”法即建基于演绎逻辑和证伪原则之上的方法。可以发现,波普尔的理论有很大创造性,但同时也有不少问题,带有明显的极端的一面。证伪原则并非适用于所有科学,明显的缺陷是只适用于全称命题而难以用于单称命

题,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较为适用,但对具体个案的研究则需要慎重。批判理性主义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更为紧密,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盛极一时,同时对哲学社会科学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爱因斯坦在1935年读到德文版《研究的逻辑》就写信支持,1950年再度高度肯定。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了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波普尔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成为科学思想史的一次重要转折,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相关原理。就像波普尔对绝对真理及决定论的批判一样,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本身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他提出任何科学本身不完善,需要通过“证伪”来推动知识的不断进化,这个主要思想是有价值的。

二、批判理性主义与《长恨歌》主题阐释的演进

据《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806年)十二月,白居易从校书郎调整屋(今陕西周至县)作县尉,陈鸿与王质夫住在盩厔,闲暇时一起游仙游寺,谈及李、杨故事感叹不已,“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1]“传”即“传注”,对《长恨歌》进行阐释。《长恨歌传》指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即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惨祸的“尤物”,阻断违背朝纲的乱源,以作为将来的鉴戒。《长恨歌传》与《长恨歌》的关系存在争论,一般认为《传》记载的创作过程是可信的。陈鸿对《长恨歌》创作的阐释是否准确可靠、目的为何,也有争议,但没有史料表明白居易本人有异议。这是今天可以看到的对《长恨歌》讽喻主题的最早诠释,

^① 1921年,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1891—1962)把清儒的考据方法总结为“大胆的假设”和“小心的求证”两条。1928年,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进一步把这两条当成科学方法:“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从提出时间来看,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波普尔的“大胆猜测,严格反驳”也可能存在某些相互影响。

几乎与《长恨歌》创作“同步”。

不过,中、晚唐时期不少人似乎并不理会陈鸿之“传”。李戡就斥责《长恨歌》为“淫言媿语”,恨“不得用法以治之”,这可视为对显然带有封建社会女祸观念的“惩戒说”的“证伪”或“纠错”。不过,以李戡为代表的纠错并不是对“惩戒说”的有色眼光进行矫正,而是用更加有色的眼光去否定“惩戒说”。晚唐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认为,“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采用毛氏训诗之论评价《长恨歌》,针对《长恨歌》的“淫言媿语”之说,强调《长恨歌》的政治价值,李戡等的不当“证伪”引发了黄滔的再“纠错”。宋代对《长恨歌》责难更多,以张戒最为极端,他的《岁寒堂诗话》干脆认为“《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各种责难集中于认为规讽、批评之意全无或极少,而对帝、妃情长的描写又远不够庄重、雅致。这是宋代理学背景下对《传》、黄滔等的“证伪”。

进入明代,对《长恨歌》的积极评价增多。何良俊说:“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令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推为古今长歌第一。”这里“推为古今长歌第一”的关键标准是“直陈时事”,可见明代的积极评价主要是否定唐宋以来的“艳体”之说,委婉肯定《长恨歌》的现实意义,虽然不够明晰,却对《长恨歌》的文学性、现实性都有比较中肯的评价,并没有简单接纳“惩戒说”,这是颇为意味深长的一次“证伪”或“纠错”。清代学者沈德潜在所选《唐诗别裁集》中沿用了明代唐汝询《唐诗解》的评论:“《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这大致反映清代学者的一般看法。乾隆年间御编《唐宋诗醇》评《长恨歌》“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则代表当时官方意见。清代基本上沿袭了对《长恨歌》讽喻意义的肯定,不过还是可以发现,清代至少对单纯归咎女祸的观点进行了某些“纠错”,主要对象由“尤物”转向对帝王的批评与启发。这种意见一直延伸到20世纪初。

20世纪20年代末,俞平伯提出了臆测性很浓的隐事说^[2],并认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是“长恨歌及传”的改写或缩写,所以“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3]。《李夫人》在白居易诗集中归入讽喻诗,陈寅恪推崇讽喻主题的意思十分清楚。这是现代讽喻说的发端,当然也是对并非没有市场的种种“隐事说”的“证伪”与“纠错”。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受当时政治环境与“左倾”思潮影响,关于《长恨歌》的阐释不但以讽喻说为主,而且大多十分尖锐。如白枫认为,《长恨歌》“通过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和他们的悲剧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反映出唐朝的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已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4],由传统讽喻演化为暴露、批判说,直指封建政治统治者及封建统治体系。这是受当时意识形态影响的极端政治化阐发。这一时期与讽喻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情说。褚斌杰先生认为,《长恨歌》反映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真挚爱情,“《长恨歌》中所描写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皇帝、一个贵妃,但诗人在诗中并不是向他们歌功颂德,或者是把他们当作封建社会神圣的权威来加以粉饰和拥护,而描写的是他们另一方面——即他们爱情的故事。……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以及很多有价值的古代童话和民间故事不都是用皇帝、国王、公主、王子等等来表现的么?”^[5]更多研究者从文学艺术的典型理论出发,认为《长恨歌》歌颂的坚贞、专一爱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20世纪50年代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二)》认为,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历史人物的帝王贵妃来写,而是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牺牲者,歌颂了那种始终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长诗后半部中的明皇和杨妃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不再是帝王和贵妃,他们已经成为体现坚贞专一爱情的形象了^[6]。罗方认为李、杨故事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7]。20世纪50、60年代爱情、讽喻说大讨论其实是互相的“证伪”与“纠错”,尽管双方都站在比较极端的立场,

这些争论在不具备定论条件的环境中保持了学术的必要“平衡”,避免了一边倒的错误。

由于讽喻、爱情两说各有所据,分歧巨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于是出现了讽喻、爱情兼有的双重主题说。一般认为王运熙首先提出了双重说:“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8]王士菁也认为《长恨歌》具有同情和批判两个方面,但却是分别针对杨贵妃、唐玄宗的,对杨贵妃是同情,对唐玄宗则是批判^①。双重说的提出实际上是讽喻、爱情说对立的必然结果,是对双方都存在的偏颇的“纠错”,其方法的成功与否另当别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恨歌》研究呈现新的面貌。首先,爱情说与讽喻说的争论继续延伸并进一步深化。不过,与50年代前后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讽喻说略占上风不同的是,80年代以来几乎是爱情说的一统天下,目前高校的中国文学史或有关《长恨歌》的选注本,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采用双重说,所谓双重说其实往往偏于爱情说^[9],单纯的讽喻说已逐渐退出高校教材和各种唐代诗歌的选注本。

马茂元、袁行霁等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力主爱情说的代表性学者。袁行霁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2卷)》认为,《长恨歌》通过“净化”等艺术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原貌,特殊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10],对爱情说作了精微的发挥。此外,围绕爱情说也出现了更多探索,如“作者寄托说”等,这些探索既是爱情说的延伸,更多证据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极端政治主题的进一步“证伪”。爱情说对“文革”以来受“左倾”影响形成的极端政治主题进行有力反驳,恐怕也在某种意义上带动了文学的人性化回归。从此以后,受意识形态——包括封建时代的“女祸”、理学及现代“左倾”思潮等影响的单一的极端的讽喻说基本上不再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再占据

主流地位,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爱情说的重要贡献,尽管单一的爱情说本身可能也存在偏颇。

在爱情说几乎一统天下的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吴庚舜、董乃斌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采“批判”说,但持论已较50、60年代温和,显示这一时期讽喻说发展的基本趋势,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爱情说“证伪”的学术效力。80年代还提出了感伤主题。陈允吉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一代中唐知识分子和大多数群众怀念“开元盛世”,“哀悼理想社会失去”,痛感“中兴”成梦,这是一件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但又无可挽回的恨事。白居易凭着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他过人的敏感,很及时地发现了它的深邃意义。“《长恨歌》作为一首感伤诗所以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根本原因就在它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整整一代人叹恨时事变迁的感伤情绪”^[11]。似乎可以说,这些研究其实是对一边倒的各种爱情说忽视了的部分的“纠错”。

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双重主题说也有新进展,在“兼有说”的基础上,80年代相继提出了“形象大于思想说”^[12]与“矛盾主题说”^[13],前者认为《长恨歌》创造的艺术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溢出了作者主观设定的讽喻主题,后者认为主、客观矛盾是导致双重说的成因,在解释双重说的形成方面有新的推进。在爱情、讽喻、感伤主题的基础上,90年代提出了三重主题说,认为“一篇作品一个主题”的艺术教条长期禁锢着我们的头脑,应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式,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居于不同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14]金学智先生认为,《长恨歌》以“情”为线索,串起了追偿感伤的正主题和追念盛世、讽喻规正的副主题^[15],也包含多重主题。这是对单纯爱情说、批判政治主题的“证伪”,也是对此前简单组合的双重说的“纠错”。

笔者提出“有情”婉讽主题,试图吸纳各说的

① 韩兆琦持“均衡”的双重说(见《唐诗选注集评》,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0页),但现在一般已不大见到。

合理因素形成新的选择方案。“有情”婉讽说立足于探寻李杨深情与政治主题的内在联系,与双重主题说致力于分析矛盾性、对立性的成因方向是不同的。首先,“有情”婉讽主题摒弃严厉的批判,回归温和的婉讽(不采用比较极端的“批判”、“讽喻”概念);同时正视李杨感情中本身包含、《长恨歌》也没有彻底剥离的政治性质(李杨有真情、深情但卷入剧烈的政治漩涡),由“纯情”回归李杨关系的本来面貌(不采用“爱情”而采更中性的“情爱”)。这样,《长恨歌》蕴含的两大要素(情爱、政治)由互相远离的极端,向互相靠拢的“中间”回归。“有情”婉讽说也摒弃了属于封建性偏见的“惩尤物”之说,认为《长恨歌》的批评对象主要是唐玄宗等封建统治者,而非杨贵妃。即《长恨歌》不是批判,而是婉讽,更不是“无情”批判,而是“有情”婉讽,这是基于历史背景及《长恨歌》“婉丽多情”文本特征的考察获得的基本结论。其次,“有情”婉讽说探索李杨深情与表达婉讽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描写真情恰恰极有利于表现特定的政治主题,因为“爱得越真、越深,就越珍贵,失去的就越多,破坏就越重,对帝王的震动就越大,教训就越应记取”^[16]。做一个大致的量化来说明这个问题:单就贵妃之死对唐玄宗的损失来说,若唐玄宗爱杨贵妃1分,则他的损失只有1分;若唐玄宗爱杨贵妃10分,则他的损失就是10分;若唐玄宗与杨贵妃根本没有感情,则唐玄宗甚至可以幸灾乐祸。唯有李、杨情深(如达到10分),感情的损失才巨大,对帝王的震动才巨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居易要表达婉讽主题就需要表现李、杨真挚感情,尤其是刻骨铭心的深情,讽劝才更有力度,对帝王才更为有效。白居易正是以帝王感情的巨大损失来写出家国深痛,李杨深情与婉讽大致是材料与观点的一体关系。如果再与白居易讽喻诗进行比较,讽喻诗偏于“晓之以理”的严厉批判,而《长恨歌》则是“动之以情”的娓娓婉劝。“有情”婉讽说是力求整合《长恨歌》主题研究各说合理因素的新尝试,自然不可避免要对前说的片面、不足等进行“证伪”与“纠错”。同样的,针对“有情”婉讽说,有补充^[17],也有批评、“证伪”^[18],这些理性的批评正

是推动学术进一步完善的宝贵动力。

三、结语

如果把历代相关阐释都集中起来,关于《长恨歌》主题的各种阐释与“证伪”恐怕难计其数。主要原因在于,《长恨歌》所采题材及其文本可能处于某种“临界”状态,具有可从不同方向进行解说、阐释的性质。这意味着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不仅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而且很可能提供了进行文学鉴赏和研究的相当重要的典型样本。围绕《长恨歌》的争论,用简单的正误去评判某一说的学术价值意义不大。既然人类不可能意外地拾得一个从天而降的“真理包”,研究者就需要自由的猜测和假设,针对问题提出试探性理论,亦因此科学探索是可错而且必然要经历许多“试错”过程。批判理性主义认为这不是科学的缺点,而恰恰是它的优点,它的力量所在,如果不作绝对化理解的话,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特性。围绕《长恨歌》的各种争论加速了新材料的发掘,激活了更多的思考,尝试了更多的可能性,都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参与争论的许多观点——或者说全部观点与论证——存在的偏颇、不足,即“可证伪性”,从批判理性主义角度来看,不过是探索过程的必然现象,这些偏颇、不足启发了后来的思考者,提动学术不断前进。抱有这样的积极心态,中国学术界可以更加理性地面对学术批评——当然也要避免意识形态或狭隘的门派之争。没有充分的理性的学术批评,难以充分激活学术界的思维,推动中国学术的深度拓展与实质提升。

[参考文献]

- [1]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之“李夫人”[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262-264.
- [2] 枫. 《长恨歌》的思想性[N]. 光明日报, 1955, 9-11.
- [3] 褚斌杰.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M]. 光明日报, 1955-7-10.
- [4] 北京大学编. 中国文学史(二)[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200-201.
- [5] 罗方. 谈“长恨歌”[N]. 光明日报, 1956-5-27.
- [6] 王运熙. 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J]. 复旦, 1959(7).

- [7] 王士菁. 唐代诗歌[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222.
- [8]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2卷)[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348-350.
- [9] 陈允吉. 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J]. 复旦学报,1985(3).
- [10] 雨辰. 形象大于思想的适例——也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J]. 郑州大学学报,1986(2).
- [11] 郭象. 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矛盾的杰作[J]. 邢台师专学报,1988(2).
- [12] 蹇长春. 《长恨歌》主题平议——兼及《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质[J]. 西北师大学报,1991(6).
- [13] 金学智. 《长恨歌》的主题多重奏——兼论诗人的创作心理与诗中的性格悲剧[J]. 文学遗产,1993(3).
- [14] 张中宇. 白居易《长恨歌》研究·前言[M]. 中华书局,2005(3).
- [15] 樊毓霖. 《长恨歌》主题辨析[J]. 阴山学刊,2009(2).
- [16] 胡可先,文艳蓉.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J]. 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2).

(责任编辑:朱德东)

New Ideas on Theme Debate about the Everlasting Regret

ZHANG Zhong-yu

(School of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Critical rationalism is also called “falsificationism” and knowledge evolutionism and believes that any kind of science theory is only a kind of hypothesis and certainly contains mistakes which need to be discovered and corrected by “falsification”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knowledge. That science contains the mistakes is not a shortcoming but is the necessity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exploration and “falsifiability” is just a mark of science for science.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Everlasting Regret is just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raising new hypothesis then “falsification”, raising new hypothesis again and then “falsification” again, finally, more approaches to real theme of The Everlasting Regret. The “falsification” of all participants makes contribution to the destiny to some extent. Critical rationalism highlights rational criticism (contention by non ideology or pure school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criticizing spirit to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his idea is of significance to boost deep expansion and real upgrade of China’s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critical rationalism; theme of The Everlasting Regret; critical spirit